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6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当代中国马克思“智库”、光明日报理论部(以下简称“智库”)联合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近百位专家学者,以及多家媒体及出版界代表莅临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中心理事长、智库荣誉理事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中心副理事长、智库理事长蔡昉,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李向军代表会议主办方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顾海良、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先后发言。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心(副理事长)高培勇主持。

提高“四个自信”：发展政治经济学恰逢其时

王伟光在题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讲话中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以及庆祝中国社

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的贺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指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经济所的一项重要工作与使命。学者们应当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观点、新思想,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纲领性文件,补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

蔡昉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经济研究所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优势,必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他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不断加强与专家学者、合作各方的联系对接,希望大家关心支持中心的建设,共同携手打造具有广泛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一流机构,努力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力量。

刘伟在发言中谈到,经济研究所作为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镇,长期以来引领着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孙冶方、许涤新、骆耕漠、董辅弼、刘国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大家。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经济研究所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需要从中国自身出发,提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因此在今天发展政治经济学恰逢其时。

顾海良认为,以话语体系为题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体现了学术眼光与境界。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之中,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支撑着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则是其他三大体系的内涵。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经济学说之所以成为学说,主要是由理论和历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所推动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讲不透理论;一旦建立了这种基础,则会融会贯通。

洪银兴表示,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应当有三个面向:首先是面向大众,尤其是面向广大的党政干部;其次是面向高层,为重要的经济决策出谋划策;其三是面向学术界,要在交流和对话中寻找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对中国经济的历史经验和发展道路进行概括和指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说明。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面对迫在眉睫的众多制度问题和发展问题,不能在回应这些问题时缺席。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可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充分进行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聚焦发展现实：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根基

随后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由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心主任王立胜,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中心副主任胡家勇分别主持。智库副理事长杨春学、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沈越等十余位学者分别以“《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构想”,“经济学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中的三个问题”,“经济学的范式革命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市民经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术语”等为题作学术演讲。

王立胜表示,经济所的中心和智库在今后的研究活动中,要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各位专家提出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措施和思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落实。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要融通经济思想史、哲学等学科,同时要系统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前三十年的关系。中国改革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理论是来自于现实的,要把握

好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

高培勇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绝非是对以往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道路、经济理论做出高度概括,以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总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的主线索在哪里,是当前理论界需要特别关注的,对于经济所下一步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刚刚组建的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为建设目标,着力凝聚、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学术功底扎实、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强的政治经济学专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研究经济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学理基础、培养研究力量,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综合)

当前经济形势与经济学

■ 迎春

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都不好:自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一直陷入萧条,按照现行的说法是“复苏乏力”,更看不到“高涨”的影子;我国经济的增速不断下滑,由两位数增长,下降到“保8”,以后又逐步下滑到年增长6.5%左右,而且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以至于政府采取“去产能”、“去库存”等政策措施。

正确认识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就必须有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不同的经济理论指导,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只有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论断,指引经济健康发展。

一、两种对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经济学:一种是西方经济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的对立,首先是由它们的哲学基础对立的:前者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后者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它包含着人们的意识、人们的能动作用,而自然界没有意识这种现象。因此,怎么认识意识和人们的能动作用对于经济运动的影响,就成为经济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济运动是由人们的意识(或者称长官意识)决定,还是由它自身运动的规律?经济运动纯粹是偶然的,还是存在着一种必然趋势?这是一切社会科学首先面临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趋势;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包括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发展是由人们的意志决定的,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前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后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后者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是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的哲学基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对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出发,认为意识不过是物质的反映,因此,它追求的是揭示物质的经济关系运动的客观规律,而西方经济学则不承认经济运动存在客观规律,追求的是如何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经济运动,采取什么政策措施等。

以对待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为例:

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至今近二百年,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就是不承认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是一种客观规律,是一种必然趋势,千方百计要“熨平”经济周期。

1929年爆发了严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以后,出现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实行了政府干预经济,主张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克服”经济危机,但是,始终没有能够“熨平”周期。

“1965年约翰逊总统宣称:‘我不相信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萨缪尔森评论说:“阿瑟·奥肯的看法比较稳重:‘衰退’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基本上可以防止的,它像飞机失事,而不像飓风。”(引自《经济学》上册第328、329页)可见,无论是美国的政客还是经济学者,都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是一种客观必然。

萨缪尔森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了大量分析经济危机的文章,虽然比一些资产阶级

学者有进步,承认“美国经济在我们的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受着经济周期的折磨”。但是,他仍然认为“狂热的经济周期已经被制服”等。他说:“近50年来有什么变化呢?出现了两个因素:第一,经济学已经掌握了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知识来控制衰退使它在出现后不致于扩大成为长期持续的萧条状态,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的危机中崩溃的话,他们就是徒劳的。第二,混合经济(指‘带有市场、命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引者注)中的选民们会要求任何执政党——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采取扩张性的行动以防止持久萧条。在19世纪伤害资本主义的狂烈的经济周期已经被制服,不过它还不是一条哈巴狗。”(《经济学》上册第330页)可见,萨缪尔森还是不承认经济危机是一种客观规律,认为可以用“知识来控制衰退”。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克服‘滞胀’以后先后迎来了80年代‘里根繁荣’和90年代的‘新经济’的增长,1990-1991、2000-2001年两次经济衰退都相对比较轻微——认为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发生了突变性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期被界定为‘大稳定’时期,各种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几乎所有的美国家宏观经济学家都研究或者涉足过这一主题。”(从“大稳定”到“大衰退”曹永福著第109页)这一事实说明,直至21世纪美国经济学界还在大肆宣传所谓的“大稳定”,说明他们对于经济危机规律性仍然持否定态度。

2008年爆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至今已近九年,世界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大体十年左右是一个周期,战后周期更短一点,一般要经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再进入新一轮危机。这一次经济危机爆发至今近九年,还处于萧条阶段,根本看不到高涨的影子,这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多次召开了“七国峰会”、“20国峰会”、达沃斯论坛等,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去年在我国召开了“杭州峰会”,提出了各种措施,今年又召开了一带一路峰会,但是,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可见,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客观规律,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如果杭州峰会出个主意,“一带一路”搞几个改变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那么经济危机早就被“克服”了。因此,这些“峰会”必将是‘过眼云烟’;政府采取的种种措施也不可能‘克服’危机,而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连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不得不哀叹:“美国经济在我们的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受着经济周期的折磨。”而他所说的:“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在等待资本主义在最后的危机中崩溃的话,他们就是徒劳的。”历史一定会证明他的预言是错误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一定不会失败的!

二、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学

马克思几乎用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一起,为科学社会学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

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经济学,它不仅否认存在经济规律,也否认物质的生产关系、否认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等的科学分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据唯物主义的理 论、物质的生产关系,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西方经济学根本就不承认物质的生产关系。在西方经济学的分类中,有“自给自足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等。(参看《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魏勋等著第19-21页 南开大学出版社)根本就没有封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科学的分类,萨缪尔森等著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制度的分类就更加荒唐,它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分为“传统社会”,“习惯可以支配一切行为”;“统治经济”;“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等。《西方经济学第12版上第40页 中国发展出版社》。西方经济学的分类方法,主要是按照由谁“决策”来划分的:“是由每个家庭决策”的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经济;“基本上是由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性计划决定的”,就是“计划经济”;“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就是“市场经济”;“混合经济一方面是指其所有制结构是由私人部门(或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混合而成的,另一方面是指其经济运行是由自由市场机制和国家机构共同调节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第19-22页)它的哲学基础仍然是人们的意志决定经济发展,所以,它不以物质的生产关系分类,而是按照由谁“决策”划分经济类别,所以,不可能有科学的分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不仅是其它社会关系的基础,而且对于生产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由人们主观决策决定的,因此,不承认经济制度对于生产发展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在历史上曾经推动过生产力的大发展。

资本主义诞生时,还是手工工具生产的阶段。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由手工工具发展到机器生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生产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逐步演变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最明显的标志。“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循环,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历史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掉,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256-257页)我们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话,是要说明他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和结果。而资产阶级的政客、学者由于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接受这种科学观点,于是不断地采取



各种措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妄图“熨平”、“克服”经济周期;在政府种种干预措施失败以后,又采取“新自由主义”,又反对政府干预,反过来,覆过去,最后爆发了当前这样一场延续时间最长的危机。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不可能接受物质生产关系的概念,不可能接受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更不可能接受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理论。

我国召开的“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峰会”等,都反映了我们这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和国家,也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打转转。一段时间政府投资四万亿,进行强力刺激;以后发现“强刺激”不能解决,下行压力加大;又提出“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口号;在生产过剩的严重形势下,最后被迫提出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但是在雇佣劳动经济制度下,妄图采取措施“克服”经济危机,仍然是在西方经济学里打转转。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改变雇佣劳动经济制度,重新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近上康庄大道!

三、建立研究社会生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著作。它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经济关系;它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与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既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法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抽象了各国特点的资本主义一般。

人们要认识现实经济运动,特别是具体到各个国家的经济运动,如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仅具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还不可能做到。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是认识当前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前提。但是,仅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知识,还不足以认清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运动的具体趋势。具体的生产发展,不仅包括生产关系的方面,而且包括生产力的方面,这就要求建立科学的统计等部门经济学,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三个产业的分类方法等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广义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准确地反映生产、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要准确地认识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同时,建立和发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方面任务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有待澄清的几个观念

■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胡怀国

(上接 02 版)

此外,数学模型通常依赖于高度简化的假设前提,再加上数学推导和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故不得不舍弃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重要方面;对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不仅面临“市场运行”而且面临“市场构建”的中国经济而言,数学模型的这种“舍弃”无疑“窄化”了经济学理论在现实经济中的应用范围。正因如此,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国内学术界,更应重视不同模型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一定要争出个高低对错,徒增无谓内耗。

结语

简言之,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简化工具,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的精妙之处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不同经济模型之间的互补性远大于替代性。如果“身在庐山”、片面理解,很可能会糟践数学这个好东西:“在人类文明中,数学如果脱离了其丰富的文化基础,就会被简化成一系列的技巧,它的形象也就被完全歪曲了”(M·克萊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第vii页)。

从学术研究看,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使用数理模型研究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应该注意避免“形式化”倾向:数学推导过程实际上是自己的思考过程,是给自己看的;给自己看的东西,同给读者分享的东西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譬如驾车旅行、上传“微博”,读者想知道的是沿途风景和人文思考,不一定要把每一次抬离合、挂挡、加油等详列清单,间或炫耀一下自己的车技!驾车技巧,自有专门的俱乐部或汽车杂志,不必要要讲给一般受众。

再比如“三高”课程,大量时间应该讲授经济模型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不同模型的精妙之处等,而不是重复推导不同模型,甚至变成小学生的“奥数”辅导班。目前的“三高”内容有必要精练(重在基本方法)、扩展(不同模型之所以然)、增加厚重感和现实感。唯有如此,才能够让学生们认识到:经济学是厚重的,经济学家是有文化的,甚至偶尔能够承载知识分子之谓。

(完)